



《土墙蝶花图》

□李晋

扬州八怪代表人物李鲜的《土墙蝶花图》现藏于南京博物院，此图是雍正五年(1727)正月，李鲜根据湖州途中的景象所摹绘，为李鲜42岁时的佳作。

李鲜(1686-1756)，字宗扬，号复堂，别号慎道人、墨磨人，江苏扬州府兴化人，明代状元宰相李春芳第六世孙。清代著名画家，扬州八怪之一。康熙五十年(1711)中举，康熙五十三(1714)年召为内廷供奉，其宫廷工笔画造诣颇深，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遭忌，乾隆三年(1738)出任山东滕县知县，颇得民心，因得罪上司而罢官。后居扬州，卖画为生。

李鲜工诗文书画，曾随蒋廷锡、高其佩学画。后受石涛影响，擅花卉、竹石、松柏，早年画风工细严谨，颇有法度。中年画风始变，转入粗笔写意，挥洒泼辣，气势充沛，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影响。

尽管李鲜绘制这张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00多年，但画面上的蝴蝶兰依然灿烂，甚至传递着某种强烈的现代气息。这显然带有后期海派绘画的基因。让我甚至揣测，李鲜在宫廷担任画家时，是否从意大利籍画家郎世宁等人那里获得启发？天真浪漫的蝴蝶兰，毫无顾忌地盛开着，充满了跃动感及生命力。

占据画面三分之一的蝴蝶兰盛开在春季，盛开在江南的雨后天，低矮的土墙是养育蝴蝶兰的襁褓，它们一簇簇地吮吸着水分，从墙头上探出身来，在下侧隐约可见的青草簇拥下，紫色的花朵如祥云般笼罩在墙头，让灰头灰脸的土墙增色不少，蝴蝶兰和青草连接处，是一片氤氲的水墨表现雨后湿润的效果，画面也因此有了鲜活质感。这样的场景在江浙一带的乡间虽很常见，但李鲜却以独特的眼光视角将它定格到画面上，酝酿出慰藉世间的暖香。

《土墙蝶花图》有别于中规中矩的传统写生画，它是当前已知李鲜最早的大写意作品，写意就是删繁就简，图简意丰地表现画面的精神内涵。李鲜对此了熟于心，老辣的线条富有张力，凝重的墨色富有层次，每一处都显示出他对色彩及布局的深入理解，同时亦能看出他对水墨的运用极为娴熟，难怪他曾自言：石涛和尚善于用墨，八大山人善于用笔，余善于用水。此言不虚。

画中的题诗后写道：淮野人家土墙头喜植蝶花，春来一片紫云掩映。一枝红杏寻春到此，逸兴遄飞，亦望酒帘小憩，顿忘归去。看这样的景，画这样的画，竟撩拨出乡愁的滋味，可以想象，李鲜是何等的多情而又浪漫。

本版图片来源网络

汉代的

浴盆

□尹钊 李佳梦 李根

说到鉴，首先要说到铜镜的产生。关于中国铜镜起源问题，前人多从古代文献资料出发，通过逻辑推理得出各自的结论。梁上椿就曾根据古代文献，提出中国铜镜起源于鉴。他把古镜的源流归纳为：止水、鉴盆中静水、无水光鉴、光面铜片、铜片背后加钮、素面镜、素地加绘彩、改绘彩加铸图纹、加铸字铭。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影响最大，许多学者都对此表示赞成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铜镜是由阳燧演变来的，也提出了一个古镜源流式。近年来，何堂坤又提出了一种新观点，认为镜由鉴来，还是镜由阳燧或铜鉴出现的年代比铜镜还要早。这样何先生提出铜镜源于多种早期较为光亮的金属器，并认为铜鉴很可能出现于铜镜之后。

铜镜与铜鉴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联系呢？商周文字中“监”字的造型，就像人立于水盆视之形。当“监”以水为镜反观自己，本义消失后，金文再加“金”（铜）另造“鑑”代替，表示用铜镜来观照影像。造字本义“人俯首在一盆静止的水面上反观自己的影像”。

因此，郭沫若说：古人以水为鉴，即以盆盛水而照容，此种水盆即称为鉴，以铜为之则作鉴。此外，在文献中“镜”又被称为“鉴”。如《周礼·考工记》有“金锡半，谓之鉴燧之剂”。郑注：鉴亦镜也。《庄子·德充符》亦曰：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这里“鉴”也当为“镜”。据此，前人在研究中国铜镜的起源时，无一不把铜镜与铜鉴联系起来，即使个别学者不赞成“镜由鉴来”的观点，但在其论述铜镜发展阶段时，还是提出：由于各种原因，铜镜虽已发明，但使用未广，才又出现铜鉴映照。实际上，以水鉴容是传统的映照方式。因此，以水鉴容的传统方式也就一直没有改变。

鉴是从用于盛水的陶器发展而来的，经历了夏、商、周三代青铜器体制的发展，由殷周时期的盘发展到春秋战国为鉴。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了陶制的盘。据1964年的《考古》记载，在江西临川新石器时代遗址、湖北京山朱家咀新石器遗址均出土了陶盘。商代早期出现了青铜盘，但数量不多，在商的晚期才逐渐流行。发展到了西周时期，特别是西周中期，盘的形制变化较大，盘腹变浅，一般都有双耳，有的还有宽流手和羹手，有的在圈足下另附足，以增加高度。春秋时期的盘窄缘浅腹，附耳圈足，盘边狭而甚浅，双耳作兽首噬注盘缘，耳上有小鸟成双为异，下为镂空圈足，边沿外撇。

到了西周晚期，鉴被用来作为盛水、盛冰和沐浴时的盥盆使用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鉴，大盆也。《庄子·则阳》中说：灵公有妻三人，同鉴而浴。由此可见，大约周代的浴具还叫做盘，到了春秋时就叫鉴了。《周礼》曰：鉴如甄，大口，以盛水，置食物于中，以御温气。鉴还被用来盛冰，其用途就好像现在的冰箱。大的鉴还可以用来洗澡。由此可见鉴在当时是一种体积较大的多功能容器。

在《青铜器名辞解》中谈到：现存的鉴，都是春秋、战国时的东西。但是从汉代墓葬出土的鉴可以得知，现存的鉴不仅限于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汉代仍有不少出土的实例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共发掘出土了3件鉴，腹内有鸡、猪、牛、羊骨以及鱼、龟等海产物。另外，随之出土的还有两枚“泰官”封泥。这些都说明了出土的鉴是一件生活实用品，而且是西汉时期南方文帝帝陪葬品。在西安三桥镇高窑村出土的西汉铜器群中，就有10件铜鉴。

下面介绍徐州墓葬出土的几件鉴。

(图二)

(图三)

银鉴(图一)，高11.4厘米，口径74.7厘米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。银鉴出土于西面第二侧室。折沿，沿口下面有两环，短颈，平底，素面。腹下部有一周折线，左旋卧刻阴文篆书“宦者尚浴银沐鉴容二石一斗五升重一钧十八斤十两第一御”25字，铭文记录了银鉴的具体用途、重量及容量，表明其是沐浴用器。用于盛水，在铜镜未出现之前，古人常用鉴盛水映照容貌。该鉴与同时出土的银锅、银盘用途相同，都是楚王及内眷沐浴用器。

铜鉴(图二)，高37厘米，口径88.5厘米。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。该铜鉴平折沿，圈底，上腹部有3圆环耳。出土于西面第二侧室，出土时其内放置有1件铜壶和2件带鸭嘴形流的铜扁壶。此鉴是该室出土体量最大的青铜器，因与银锅、银鉴等沐浴用器同出，当是沐浴用器。《庄子·则阳》记载：灵公有妻三人，同鉴而浴。由此可知，先秦时期，鉴就是沐浴用器。灵公沐浴的铜鉴可容纳3人同浴，体量应当非常巨大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这件铜鉴的体量似不能容人进去沐浴，应是用来盛沐浴用水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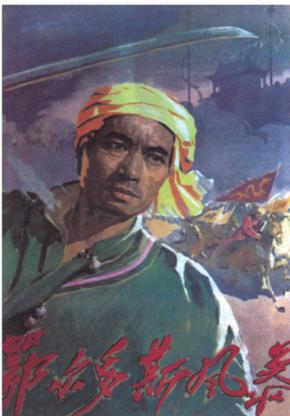
汉代，沐浴成为社会性的习俗，朝廷内外都非常注重穿着仪容的整洁，沐浴成为汉代朝廷官员法定的假期。2005年徐州羊鬼山陪葬坑出土了数个大铜鉴、铜扁壶、铜臼、铜杵、铜量等沐浴器具。这些表明，楚国王室也非常重视沐浴。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沐浴器具种类繁多，沐浴用器有银锅、银鉴、铜鉴、铜扁壶、铜釜、铜灯等，功用包括了照明、煮水、盛水、浇水等。沐浴用具还有搓澡用的搓石、保健沐浴用的药材、擦干身体用的浴巾、装扮用的铜镜和化妆品等等。

青铜鉴(图三)直径30厘米，高20厘米，口缘较宽，敛口鼓腹，一对衔环，其下有短圈足。鉴为盛水或冰之器。出土于徐州。因为体积较小，我们认为其是用来盛沐浴用水的。

古人从陶器到盘和匜发展成为掌冰、藏冰、寒尸、盥洗等用途的鉴，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湛工艺和非凡创造力。



(图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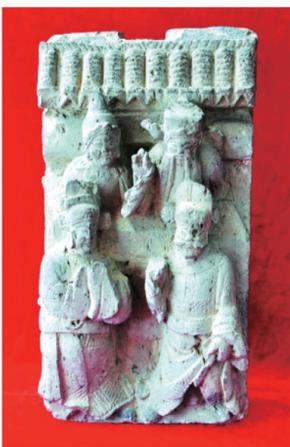


《鄂尔多斯风暴》

□张文

电影《鄂尔多斯风暴》(如图)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于1962年，导演郝光。影片讲述了蒙古族英雄乌力吉的事迹，他的父亲敖其尔于1916年领导蒙古族人民开展了以减租减息为宗旨的独贵龙运动，斗争失败后惨遭王爷杀害。十几年后，历经磨难的乌力吉在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刘洪泰的引导下，回到家乡鄂尔多斯地区组织开展了新的独贵龙运动。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协助下取得胜利，成功地塑造了草原英雄形象。

《鄂尔多斯风暴》是由我区著名作家云照光创作的，这是他创作的第一个电影剧本，自治区为其颁发了优秀创作奖。



徽派砖雕

□夏昕

人们常把秦砖汉瓦视为文物古珍的象征。因为秦汉时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了，当年土烧易碎的砖瓦，若能传之后人当然难得可贵。

友人知我喜欢砖瓦石头之类，特地从农村搞来了一块长27厘米、宽16厘米、厚8厘米的清代徽派人物砖雕(如图)。砖上塑有4个古代人物，刻画仔细，神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屋顶上瓦片排列有序，瓦上砖块由中间向两边倾斜，瓦当清晰可见。图右上为最年长者，头戴官帽，面目慈祥，长须飘拂，右手作招手状；其左是一位美貌女子，头戴高髻，身着霞帔，面带微笑，一看便知是有身份的官家贵妇；她下面是一位年轻官员，双手作揖，表情严肃，状态恭敬，官袍下方的海浪纹清晰可见，足见其做工的精致；剩下的一位头戴官帽，身着官袍的人，脸上长着八字胡，胸前补子上的纹样很清楚，由于砖面破损，右手不知手持何物，左手撩起官服作大步行走状。砖的背面有和其他砖雕连接的槽口，起码应该还有许多块和它组成一套或数套故事。

徽州砖雕由明代徽州窑匠鲍四首创，是古代徽州地区汉族传统建筑雕刻艺术及青砖雕刻工艺品，用质地坚细的青灰砖经过精致的雕镂而成，广泛用于徽派风格的门楼、门套、门楣、屋檐、屋顶等处，使得建筑物看上去典雅、庄重。

鉴

□冯硕



(图一)



(图二)

花钱源于汉代，是古代民间茶余饭后自娱自乐的一种玩钱，不能作为钱币流通使用，是钱币中的非正用品。花钱种类繁多，它的内容从婚嫁嫁娶到诞辰祝寿，从辟邪除恶到因果报应，从佛教经文到道教符咒，从飞禽走兽到神仙鬼怪，从花草树木到亭台楼阁，从历史故事到诗词曲赋等，几乎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，可以说丰富的内容造就了多彩的纹饰，不论是图还是文，图文必有意，意必吉祥。

我收藏的一枚花钱(图一)采用了独特的八角八边形，铸造于清末。正面是诗书教子忠孝传家，语出自一副古联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。据说这副古联来源于宋朝的大文豪苏轼写过的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《三

花钱

槐堂铭》，文中主要记述从祖父王祐到孙子王旦忠厚仁义、廉洁传家的美德。王旦的祖辈、父辈已是显赫，下一辈中，王家又出了王素、王质、王端3个进士，都是德才兼备，孙辈、曾孙辈中也是人才辈出。在整个宋朝300余年的历史中，三槐王氏家族几乎代代都有人在朝廷为官，都能做到忠孝仁厚、廉洁奉公、正直坦荡。自宋以来，悠悠千百年，虽然历尽人世沧桑，三槐王氏的后裔绵延不息，分布在各地。

花钱背面书写“积金非宝，壹艺遗业”，出自我国南北朝的颜之推所著的《颜氏家训·勉学篇》：“积财千万，不如薄技在身。意为积蓄了千万家财留给子孙后代，终有用光花完的一天，倒不如教会他们一技之长，从而勤劳持家，得以终身受用。《颜氏家训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、体系宏大的家训，

后世称之为：古今家训，以此为祖。

与此类似的是另一枚花钱(图二)，正面是忠厚传家，也是取古联“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”之意。背面是敦诗说礼，意思是诚恳地学《诗经》，大力讲《仪礼》，要按照温柔敦厚的精神和古礼的规定办事。文风鼎盛，耕读传家的古风透过这枚花钱散发出来，让后人心生敬意。

古人对传承家风非常重视，如清代郑板桥在《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》中说：“富贵足以愚人，而贫贱足以立志而发愤。清代王永彬在《围炉夜话》中说：“富家惯习骄奢，最难教子，寒士欲散家财，还是读书。”

两枚花钱寥寥数语，却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传统家训的精髓，良好的家风也是支撑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兴旺发展的精神内涵。